



蒋捍东 我们是“战友”



蒋捍东 教授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刚刚建成的雷神山医院，有时还能听到外面机器的轰鸣声。在一片喧闹的环境中，电话突然响起，那头通知说，5分钟后，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即将到来。

“我是肯定要来武汉的”

接到电话的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员蒋捍东教授彼时已经全副武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这位曾经经历过SARS的老兵在接到援鄂通知时，心中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是肯定要来的，既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又是科室主任，已经做好了随时听命上战场的准备。”

尽管之前已经从同行及媒体那里了解到了武汉的部分情况，但当真正看到武汉的情景时，他仍是吃了一惊。空荡

的机场，空荡荡的街道，除了来迎接的人员，很少能看到其他无关人员出现在街道上，压力感陡然而生。

当时的雷神山医院边建边收治患者，面对一个医疗设备未到位、信息操作系統需调试、甚至病床上的床单、被褥都没有的病区。在上海仁济医院张继东副院长的带领下，他们验收病房，自己运输部分设备，拆包装、安装、调试，做保洁工作，只为了能尽快“开张”。经过紧张的筹备，ICU于在96小时后“营业”，蒋捍东担任新落成的ICU病区科主任。

病毒来了，我们上

病区迎来的第一位“客人”便是一位气管插管患者，氧饱和度非常低。他们迅速为患者“上”了呼吸机，患者情况逐渐缓解。还有一个患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钱”，他是一位50多岁的武汉人，住在15床。这位患者的救治经历可谓一波三折。蒋捍东教授介绍，在行气管插管后，他感染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菌种——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菌。

“这种情况非常难治！”他也在心底为患者捏了一把汗。

“当时大家每天都讨论这位患者救治方案，后来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这位患者终于渡过了呼吸机抢救、感染等生死攸关的难关。后来还上了体外膜肺氧合(ECMO)，成功脱机康复。”不久前，患者还发来了感谢视频，并展示了自己的康复情况，这让蒋捍东教授倍感欣慰，“可以说，他见证了我们在雷神山医院ICU的工作。”

作为病区主任，蒋捍东教授一直将“降低患者死亡率、提高治疗成功率、救治成功更多的患者”视为目标。为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我们的团队是当时整建制带过去的，各个科室的医生都有，后来我们把各科室医生混编，甚至还根据医师的专业组建了护心组、护肝组、护肾组、插管组等治疗小组，从各科室角度一同来诊治新冠肺炎。”通过多学科会诊，提高新冠肺炎的救治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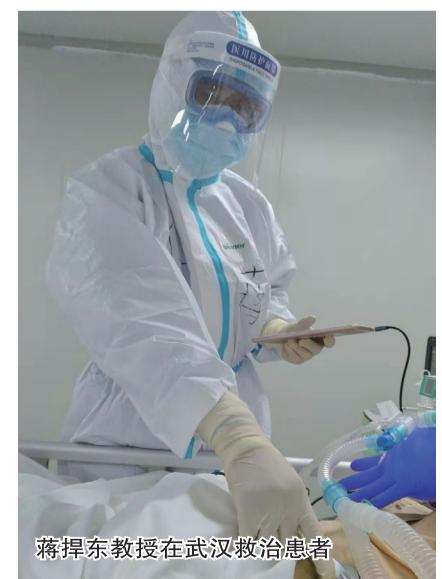
在治疗过程中，他们通过早期上呼吸机、及时给患者做俯卧位通气，给危重患者上ECMO等方法，逐渐提高了新冠肺炎救治成功率。“我们每天早晨都有针对特殊患者的病例讨论会，通过共同探讨后，制定出一种更加成熟的综合治疗方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专家远程治疗方案的及时反馈以及后来到达的

仁济医院ECMO团队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此次武汉之战，将成为蒋捍东教授永远难忘的一段经历。他说：“去了武汉以后，大家都相互称战友，尽管我们不是军人，但这份战友情是真真切切的。”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治病救人，这是所有医护人员冒着生死的危险奔赴的一场战斗。蒋捍东教授这样说道，“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不论何时，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一定会上前线。”正如张伯礼院士曾哽咽着说过的一句话，“战争来了，将士们上。病毒来了，我们上”。医者在这一刻也是战士。

“在武汉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有医生说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但是我们没能去成。”他说，如果有时间，想去看工作过的雷神山医院现在是什么模样，住过的宾馆变成了什么样子，还没看成的武大樱花，不知道经历过这场疫情是否格外美丽？



蒋捍东教授在武汉救治患者

傅小芳 当好“保护神”！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来武汉前，我是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的！”坚定的话语后是更加坚定的决心，说这句话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傅小芳，她是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里年龄最大的专家。

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很难体会危险来临时的孤注一掷，在灾难来临时，总有一群人愿意为我们挡在前面，当病毒来临时，这个群体是医生。



傅小芳 主任

“我来是为稳定军心的”

坐在镜头前的傅小芳一头微卷的短发，笑容和蔼亲切。谈及当时在武汉抗疫的经历，仍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不舍与感动。“我是在半夜接到通知要去武汉，这个时间点通知一定是大事情。在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像战时，大家有可能随时赴死一样。另外，我过来也是稳定军心的。”

对更多援鄂队员来说，傅小芳更像是一个“保护神”的角色，只要她在现场，大家就充满了安全感，军心也更加稳定。抗疫一线医生在舱内保护患者安全，而感控人员的职责则是避免所有医生出现被感染的风险。加上傅小芳在内，感控组共有8名成员，24小时轮班，不间断地护卫着医生们的健康。

总领队张继东副院长对傅小芳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加强自我管理；第二、加强互相监督；第三、加强问题导向的管理；第四、加强驻地管理。“一定不能让

我们任何一位医务人员发生感染。”傅小芳介绍，到达武汉后，感控组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严控风险；二是严密防护；三是严密监控。他们在第一时间对医务人员可能遇到的感染风险进行评估，并列出了七大风险项。现场病区布局、风险提示标志、负压病房中的负压值到位情况，种种工作都不容一丝马虎。他们用A4纸打印医护人员进出舱防护用品穿脱流程，拍摄穿脱防护服流程视频发进工作微信群，制定培训计划，在两天时间内培训了200多人次即将进舱的工作人员。

对于医护人员可能在舱内发生的锐器伤、晕厥等特殊情况，感控组也都提前做出预案。此外，8个人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严密监控医护人员进出舱穿脱防护服全过程，事无巨细。这些最后都派上了用场，一位出舱后差点晕厥的护士被及时发现，感控组队员马上上前帮忙，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险。

防护服上的思念与祝愿

在雷神山的第一周，傅小芳感慨说，“当时真的是差点要累趴下了，张继东副院长曾经开玩笑说，你一天不出现在雷神山医院，我就担心了。”为了这句话，为了所有医护人员的安全，傅小芳仍是坚持了下来。辛苦有时，感动更是常在。提起发生在雷神山的故事，她的眼角忍不住湿润了。为了辨别名字，很多援鄂队员都会请傅小芳帮忙在防护服上写字。一位上海“囡囡”请她帮忙在防护服上写上“祝爸爸化疗顺利。”得知这位同事的父亲第二天就要在上海进行化疗，傅小芳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

“傅妈妈，你看我像谁？”刚穿上防护服的护士戴倩这样问道，“我觉得你像蒙娜丽莎。”为了缓解众人的紧张情绪，傅小芳常常会跟他们开玩笑，然后戴倩防护服上就多了“蒙娜丽莎”这个名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办主任庄捷一直承担着医疗队之间联络员的工作，本来不必进舱，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胃肠科医生。为了抢救一位患者，他多次进舱为这位患者行十二指肠胃肠道插管，在救死扶伤时，他没有一丝的犹豫。

曾被反复叮嘱不要与患者密切接触的

张继东副院长，一进舱内，为了鼓励患者，坚持与每位清醒的患者握手。有一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毛青主任请傅小芳在防护服上写“你梦到的毛医生是这样的吗？”并拍了一张照片。原来一位曾被他救治成功的小男孩看到了上海援鄂医疗队出征的消息，有一天突然梦见毛医生也去援鄂了，他半夜哭醒了，便哭闹着让妈妈联系毛青主任。此时，毛主任确实人已在武汉了，为了安抚这位小患者，才有了上面的经过。

“关于武汉，我有太多难忘的记忆，我们医务人员真的就像白衣战士一样，是不辱使命的、冲锋在前的。”她说，我在每个队员身上都看到了爱、善良、无私、勇敢和坚毅。医者的大爱无疆，着实令人动容。



关联阅读
扫二
全文